



# 自塑与他塑:宋元易代之际文天祥形象的生成和建构<sup>\*</sup>

刘婷婷

**摘要:**文天祥形象的最初生成和建构建立在自我和他人双重书写的路上。他起兵勤王后著《指南录》《集杜诗》等作,有意识地保存个体经历,并奠定形象基础。经五坡岭被执后,士人以诗文生祭、探监,赋予其形象表率意义。到柴市就义后,全社会广泛悼念与赞颂,凝定其精神风骨,文天祥成为忠节的典范。通过对独特历史语境下相关文学作品、事件、现象的回溯与挖掘,可清晰见到历史伟人的真实个体与文学形象从相生到相融的过程,有助于深入了解宋元易代之际丰富的士人心态与文学风貌。

**关键词:**易代之际;文天祥;形象;生成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6-0049-08

文天祥的精神和文学创作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论题,关于他的形象如何典型化则涉及不多。历史人物的意义发现与形象塑造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有学者已对明清时期文天祥的形象塑造加以探讨<sup>①</sup>,然对文天祥形象在宋末元初的最初生成与建构,尚未有深入把握的成果。文学作品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最佳载体,在官方的议谥、祠祭等尚未出现前,文天祥形象的建构离不开当时的文学书写。除他自身的创作外,士人们围绕他的众多寄赠、祭悼、传赞之作也具有重要的文学、文化学意义。因此,本文尝试综观此一二十年间的相关作品,探寻其生成逻辑与内在关系,并串联士人生祭、探监、哭悼文天祥等事件,探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勾勒宋元易代之际文天祥形象在文学领域的生成、建构路径和特征,从中不仅可见到历史伟人的真实个体与文学形象从相生、互动到相融的过程,还可更深切地了解

当时丰富的士人心态与文学风貌。

## 一、奠定基础:文天祥后期的自传意识和自我书写

以国破为界,文天祥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不同时期的理念、风格、文学价值等差别较大。对于文天祥后期的作品,学者们除高度赞扬其爱国情怀外,也注意到其自传性质,如刘华民指出文天祥后期的诗歌也可以说是一部诗体自传<sup>②</sup>,王莹将《指南录后序》《正气歌》等文视为“自传文本”进行深入解析<sup>③</sup>。这一视角为全面、深入理解文天祥后期的创作心理及系列作品带来新的启发。还需进一步探讨的是,文天祥的自传意识如何逐渐明确并主导其创作,这种自传式书写在其形象典型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据《宋史》本传,文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

收稿日期:2025-05-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元易代之际文人心态与文学创作研究(1274—1283)”(20BZW107)。

作者简介:刘婷婷,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 311121),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sup>[1]12533</sup>对不朽的追求在文天祥青少年时即已产生，也是他此后救国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宋亡之际，文天祥两次勤王活动先后失败，建功立业已不可期，他在一定程度上转而追求个人形象的不朽。关于这一点，从他自国亡被俘后、北上至关押于元朝燕京（今北京）监狱的心路历程中探寻可见。

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崖山之战后，南宋彻底覆亡，文天祥被囚于海舟，元将张宏范对他问：“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sup>[2]350</sup>文天祥回答：“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sup>[2]350-351</sup>这段对话被他记进《有感》的诗序中。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张宏范还是文天祥本人，都认为他的历史形象足以不朽，区别仅在于是否有人为他来书写。在该组诗中，文天祥一方面写下“花随春共去”<sup>[2]350</sup>之句，感慨南宋大势已去，同时又写道：“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岂因徼后福，其肯蹈危机？”<sup>[2]351</sup>可见，文天祥立志成为“烈士”。尽管文天祥对于身后事表现得很坦然，但“书与不书”的区别已经在他心中产生影响。

该年六月，文天祥北解途中，滞留建康（今江苏南京）时，一直陪伴他的友人邓光荐因病不能继续北上，分别之际，文天祥郑重托付对方为自己作传：“死矣烦公传，北方人是非。”<sup>[2]357</sup>首次公开表达出对个人身后墓志铭的重视。墓志铭记录传主一生的行迹，彰显其一生的功德，并借助石碑等载体流传后世。邓光荐，字中甫，又字中斋，他与文天祥“年相若，又同里闻，以斯文相好”<sup>[2]358</sup>，是文天祥的同乡兼好友，并曾加入文天祥的勤王队伍。文天祥选择邓光荐作为身后事的书写者，并非要借助对方的文化影响，而是认为他是了解自己、值得信赖之人。

十月，文天祥被押至元大都（今北京）的会同馆，他作《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组诗，其中慨叹：“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sup>[2]387</sup>仔细体会诗中之意，可看出他身陷囹圄，却无惧死之意，只是遗憾将来无人为自己作传，担忧个人的经历会沦为世人眼中的野史逸闻。诗中表达出的遗憾和忧虑与数月前并无二致。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六月，文天祥被押于土牢，在给其弟文璧的信中，他又提到让邓光荐为自己作墓志铭之事：“自广达建康日，与中甫邓先生居，俱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若时未可出，则姑藏之将来。”<sup>[2]465</sup>他还细致地指出了时局是否允许的问题，此时上距文天祥与邓光荐分别已两年。

可见，自南宋亡国后的两三年里，如何将个人事迹更好地流传下去一直是萦绕文天祥的心事。他一方面将作传的任务托付给邓光荐，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以诗文来记录人生，并将作品汇编成集。自宋德祐元年（1275年）奉诏起兵勤王到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就义的七八年间，在紧张的逃亡、战斗、被俘生涯中，“间以诗记所遭”<sup>[2]313</sup>。文天祥创作颇丰，除《指南录》《集杜诗》外，还有年谱《纪年录》。同时，他身居牢狱时流播于外的诗歌被时人编为《吟啸集》。

明末清初黄宗羲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南宋小朝廷的流亡史，《万履安先生诗序》云：“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sup>[3]</sup>但细读文天祥的后期诗文，不难看出，宋元之际山河破碎、重组的过程仅是作品的背景和底色，个体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和忠诚之心才是作品的重心。文天祥以《指南录》记出使元营、遭遇扣留、逃脱南下等经过，《指南后录》记兵败被执、北押大都、囚系燕狱的经历，《集杜诗》二百首记狱中所忆之易代之际的人与事，《纪年录》自谱生平，更不必说。这些作品的创作动因就如他在为《集杜诗》所作的序言中所言：“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sup>[2]397</sup>

吕薇芬、徐公持指出，中国古代自传性文章的特点是往往偏重于抒发胸臆和志向，长于发挥自己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感慨<sup>④</sup>，这一特点在文天祥的作品中颇为明显。他在记录行迹的同时，也注重抒写自己的坚定信念，如作于景炎元年（1276年）的《指南录后序》中，文天祥刻意强调要“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至[志]焉”<sup>[2]313</sup>。《纪年录》“己卯”条中，文天祥详细记载自己与元丞相博罗的言语交锋后，结尾云：“予自记一宗入狱本末于此，曰：‘予死矣，庶几有知予心者。’”<sup>[2]462</sup>因此，在众多诗歌中，文天祥直白地表

达自己的情感立场，如“不指南方不肯休”<sup>[2]343</sup>与“无奈天生一寸丹”<sup>[2]387</sup>的赤诚忠心、“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sup>[2]337</sup>的必死决心等，以向不同时空的读者传递自己的“志”与“心”。

真实、曲折的个体经历和执着、高贵的人格充分展示了文天祥的外在行迹与内在精神，孤忠尽节的主体形象跃然纸上。文天祥的自我书写在其形象典型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由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效应，文天祥文集的广泛流传使得他的个人形象深入人心。文天祥的后期诗文纪实性强，其中的细节和内心体验源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和作者身份，独特且无法复制。兼之其作品情感饱满，语言质朴直击人心，极易引发读者的理解与同情。南宋遗民汪元量在《浮丘道人招魂歌》中这样描述文天祥诗文的强大感染力：“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呻吟泪痕湿。”<sup>[4]112</sup>据《纪年录》“壬午”条注文，文天祥被囚燕京期间，已经“翰墨满燕市”<sup>[2]466</sup>。他就义后，《吟啸集》和《集杜诗》等一直流传于世。南宋遗民何梦桂就在《文山诗序》中说：“其所流落人间者，唯有流离中《吟啸诗史》与狴犴中《杜诗集句》耳。使人读之，至今凛凛有生气。”<sup>[5]</sup>元朝元贞、大德年间，文天祥的作品首次结集出版，明、清两代屡次翻刻。随着其诗文的传播，人们日渐熟知他的艰难经历。尽管斯人已逝，读者仍可通过文天祥的作品了解他的行迹，感受他的精神，数百年后仍能产生强烈共鸣，就如明代王守仁在《文山别集序》中感叹的：“其间所值险阻艰难，颠沛万状，非先生之自述，世固无从而知者。先生忠节盖宇宙，皆于是为[而]有据。后之人因词考迹，感先生之大义，油然兴起其忠君爱国之心。”<sup>[2]521</sup>

其二，文天祥的自我书写为后世相关传记、戏曲、小说等作品奠定了形象基础，提供了史料来源。文天祥的人生大事件在其诗文中已有完整书写，后人在进行相关创作时，多以其文集为底本进行阐发。除文天祥就义前一年及身后之事外，其余场景、人物等基本不出《指南录》《集杜诗》《纪年录》的范围。如元、明以来的诸种文天祥传记，以元代刘岳申、明代胡广所著影响最大，二人的写作均参考了文天祥的文集。胡广

《丞相传》文末载：刘岳申为庐陵后学，与南宋故老多往来，他所撰《文丞相传》较《宋史·文天祥传》“为详”，在成文过程中，除广征乡邦见闻外，“又必参诸丞相年谱及《指南录》诸编，故事迹核实可征”<sup>[2]504</sup>。刘岳申《文丞相传》在元代即“盛行于天下”<sup>[2]504</sup>，胡广作《丞相传》时，则在刘氏传记的基础上，再一次“取证于丞相文集，芟其繁复，正其讹舛，庶几全备，使人无惑”<sup>[2]504</sup>。文天祥的自我书写保证其行迹在时间的流逝中不变形，实现了他让“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的创作初衷。

## 二、赋予意义：士人的生祭、探监诗文

自文天祥被俘后，士人多次以文生祭文天祥，并在探监时以诗文劝勉他早日就义。这些有悖常理的举动和略显激进的文字在文学史上可谓罕见，这些作品在凸显写作者的爱国之情外，对文天祥及其形象的塑造也有重要意义。

文天祥自镇江（今江苏镇江）脱险南逃后，即在江西组建幕府、召集军队，他的身边聚集起一批志士，但景炎二年（1277年）八月的空坑一战损失惨重，其部属多被俘：“军士皆溃……吴文炳、林栋、刘洙皆被执归隆兴。”<sup>[1]12537-12538</sup>文天祥也家人散失：“失欧阳夫人、一子、二女。”<sup>[2]456</sup>次年十二月，文天祥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大败，近全军覆没。至此，文天祥的军事抗争活动全面失败，他进入与元朝精神抗争的阶段。北解途中，文天祥曾绝食数日，期待能死在故乡，刘岳申《文丞相传》记其绝食的经过云：“即绝粒不食，计日可首丘庐陵。乃为文祭墓，为诗别诸友，遣人驰归，约日复命庐陵城下，即瞑目长逝。乃水盛风驶，前一日过庐陵。”<sup>[2]492</sup>首丘之愿未能遂，他又恢复饮食：“念不得死庐陵，而委命荒江，志节不白，始欲从容就义，强复饮食。”<sup>[2]492</sup>经历数月的长途跋涉，文天祥于祥兴二年（1279年）十月抵达元大都，开始了三年多的牢狱生涯。

在易代之际，文天祥的生死抉择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更是一种充满政治意涵的姿态，关乎故国形象的存续与集体认同的维系。由于时空阻隔等原因，时人并不知晓文天祥自

杀未遂之事，只看到他没能在兵败国亡后即刻赴死，而是作为俘虏被押北上。这给南宋遗民，尤其是熟识文天祥的江西庐陵士人带来忧虑，由此激发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行为，即在文天祥北解途中，以生祭之文来督促文天祥以死明志。

祭文本是表达“生者悼惜死者之情”<sup>[6]</sup>的文体，对于尚存于人间的生者之祭，在文学史上多见于文人的自祭与自挽，如陶渊明的《自祭文》即是<sup>[5]</sup>。现完整留存两篇生祭文天祥的文章，作者均为文天祥的乡人。一为王炎午，他曾追随文天祥起兵，却又中途退却，当得知文天祥北上要经过江西境内时，遂“作《生祭丞相文》……自赣至洪，于驿途、水步、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一见”<sup>[2]513</sup>。另一为王幼孙，他曾当面生祭文天祥，元代程钜夫《自观先生王君墓碣》载当时的情状：“宋之亡，其友文丞相兵败，执以归。过庐陵，谒于驿舍，为文祭之，期以必死，辞气慷慨。左右呜咽，莫能仰视。”<sup>[7]</sup>

对于生祭文天祥的目的，王炎午在文中交代得非常清楚：“仆于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sup>[2]513</sup>他为何要“速丞相之死”？一是出于现实考量，如文天祥的存在可能导致原南宋皇室被俘成员受到虐待等。二是维护当时摇摇欲坠的纲常，就如元人揭傒斯所作《书王鼎翁文集后序》所言：“士生于世，不幸当国家破亡之时，欲为一死而无可死之地，又作为文章以望其友为万世立纲常，其志亦可悲矣。”<sup>[8]</sup>他们希望以文天祥之死来证明宋代涵养士风的成效，以此将其塑造为后世的楷模，从而实现“宋亡而赵不绝”<sup>[2]515</sup>的文化信念。

王炎午在《生祭文丞相文》中，详细列举了文天祥的可死之因：

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第  
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  
之荣；奉母，极东西迎养之乐。为子孝，可  
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  
可死。仗义勤王，使命不辱，不负所学，可  
死。<sup>[2]513</sup>

文章从科第、尽孝、功名、道义等方面概括文天祥的一生，寓其才情、人伦、地位、气节等立身行

事的重要元素。他有状元宰相的身份标签，身荷朝廷恩遇，且在国势倾危时勇担重任，是忠臣兼孝子。王炎午等人抽绎、强化了文天祥“状元宰相”的身份特点和“不负所学”的人生际遇，将各种身份要素集中于文天祥一身，赋予了文天祥形象典范意义。

士人笔下的文天祥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历史上文天祥在宋亡前的仕途并不顺利，宝祐四年（1256年），文天祥时年二十一岁，参加科举考试时被理宗“亲拔为第一”<sup>[1]12533</sup>，后却因与宦官董宋臣、宰相贾似道等人意见不合而屡被摈弃。咸淳三年（1267年），文天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左郎官，朝廷的诰词中写道：与他同科的进士“无不登进”<sup>[2]446</sup>，唯独文天祥“淹恤在外，尚迟向用”<sup>[2]446</sup>。直到宋元易代的非常时刻，他才临危受命为宰相，登上政治舞台中央。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与元军的艰难谈判和勤王救国，正如龚开在《宋文丞相传》中指出的：“一身在朝，拥将相虚位。”<sup>[9]</sup>

文天祥被士人们构建成理想形象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必死”的义务。王炎午等人在以行动引导舆论、创设氛围，劝勉文天祥“勇于就义”的同时，还督促文天祥速死。王炎午在《生祭文丞相文》中，进一步指出“降与死当有分矣”<sup>[2]514</sup>，最好的死亡方式是效仿唐朝李光弼等人的主动“自刎”，而非迫不得已死于他人之手，即“死于义，死于势”<sup>[2]514</sup>。

其时，士人中担忧文天祥终会投降的想法并不鲜见，除王炎午、王幼孙等人的生祭外，士人们还有赠别、探监等举动，并以诗文勉励文天祥，以促其早日就义。如乡人刘应凤在文天祥北解途经江西时，作《送文总管朝燕》四首以赠别，其中第三首为：“夹道红旗驻马蹄，乡人将喜又将疑。天留中子继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sup>[10]43912</sup>此诗中，刘应凤描绘了乡人送别文天祥北上的场景，对于“将喜又将疑”“西山饭伯夷”等微妙表述，他向王炎午解释诗中深意时说：“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矣。”<sup>[2]513</sup>可见他是以此诗警醒文天祥。

此外，文天祥被押至燕京后，旧友新交接踵探访他，既有宋恭帝赵㬎和元臣张宏范、博罗等，还有文天祥的昔日僚友、亲属，如王积翁、文

璧等，他们多为劝降而来。此中，南宋遗民汪元量的目的与众不同，他两度来监狱探访文天祥，并非劝降，而是劝死。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中秋，汪元量首次探监，该年十月随即又来，文天祥《胡笳曲》诗序记云：“庚辰中秋日，水云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水云别去，是岁十月复来。”<sup>[2]369-370</sup>会面时，二人弹琴论道，相与甚欢，汪元量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sup>[4]264</sup>，且作《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等诗，诗中鼓舞文天祥“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sup>[4]102</sup>，并表示自己会“与君生死同”<sup>[4]102</sup>。文天祥则回赠以诗。汪元量是杭州人，作为一名供奉宫廷的琴师，他在宋亡之前与文天祥几无往来。他的来访进一步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天祥“必死”却未死的观望已不再局限于他的故交旧友，而在南宋遗民中广泛蔓延。

士人们的生祭与探监诗文在反映南宋遗民焦虑情绪的同时，也切实在消解文天祥面对生死抉择的犹豫。在北解途中和大都监狱里，文天祥一直以坚定的语言和行动回应士人群体的质疑和催促。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文天祥被俘过吉安（今江西吉安），王幼孙、刘应凤等人在此送别，在离开时的《发吉州》诗中，文天祥坦然表白：

皇纲解纽地维折，妾妇偷生自为贼。  
英雄扼腕怒须赤，贯日血忠死穷北。<sup>[2]353</sup>

十余日后，途经建康，与友人邓光荐分别时，文天祥与其唱和《酌江月》词，中云：

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sup>[2]357</sup>  
他又一次书写心迹，剖白自己的“丹心”。文天祥于该年十月抵达大都，次月，面对元相博罗的多次劝降，身戴枷锁、被迫跪地的文天祥回复：“我为宋宰相，国亡，职当死。”<sup>[2]461</sup>宋降臣王积翁、谢昌元等人将元统治者欲重用文天祥的消息传达给他，他径直回复：“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sup>[2]493</sup>

至元十九年（1282年）春，文天祥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作《衣带赞》，序云：

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诀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sup>[2]465</sup>

文中解释自己“当死久矣”，却“欲引诀而无间”的现实困境，此语也可被视为文天祥对他人偏见、质疑的最后一次回应。

从士人们的生祭、探监之作和文天祥的屡次回应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易代之际士大夫内心的煎熬与抉择的艰难。

### 三、凝定风骨：就义后南宋遗民的相关主题创作

从上文中各地士人对文天祥的密切关注可以看出，文天祥的就义是一个他和南宋志士、遗民共同奔赴的历史事件。重大历史事件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宋元易代之际临安城破、三宫北上、崖山海战等都在文人笔下集中呈现。文天祥就义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尾声，他的英勇赴死给士人们造成了情感冲击，而他集状元宰相、忠臣烈士于一体的完美身份和无力回天、以身殉国的悲剧命运形成了巨大张力，吸引众多文人士大夫来参与这一特殊政治生态和历史语境下的主题创作。

在燕三年，文天祥长时间身居环境极其恶劣的土牢，经常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但王炎午等人在《生祭文丞相文》中所担忧的其忠心会“日久月积，志消气馁”<sup>[2]514</sup>，最终像汉代李陵一样妥协投降的事情并未发生。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往刑场，他临终前犹向南拜别，“曰：‘臣报国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有七”<sup>[2]466</sup>。次年，文天祥的灵柩归葬故乡富田（今江西富田）。文天祥殉国，其个体价值与群体期待最终合一。

文天祥柴市就义后，士大夫阶层在表现出普遍的震惊和悲痛之余，还有一种“事毕”的踏实感。王炎午、王幼孙等人在吉安闻讯，又速作文望祭，抒发“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sup>[2]515</sup>的哀悼之情；汪元量则作《浮丘道人招魂歌》表达痛惜之感。同时，更多士人主动参与进来，正如邓光荐《文信国公墓志铭》所形容的：“南北之人，无问识与不识，莫不流涕惊叹，乐道其平生。”<sup>[11]420</sup>元明之际赵汸在《跋谢翱西台恸哭记后》中甚至说：“江南人哀之，有甚于蜀人哀武侯者。”<sup>[12]</sup>

以文天祥就义后的十年左右为界，文坛出

现了一波以他为中心的主题创作,其形式主要有以文哀悼文天祥、为其人作碑传、为其诗文作序跋、为其画像作赞、追和其作等。参与人数众多,参与方式多样,相关作品十分丰富。这些作品或激荡回肠,或感伤叹惋,在人心离散的宋元易代之际构筑了一道独特的文坛风景,如元人吴师道所著《吴礼部诗话》中特意列出“文文山死节,诸公伤悼之作”<sup>[13]</sup>条,并详载了邓光荐、李谨思、黄诚性、谢翱四人的诗作。

就参与创作的主体而言,作者囊括不同地域、身份的文人。刘文源《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一书汇编了自宋末至“五四”时期有关文天祥的评述资料,颇为详备。据此书,结合创作者的年代、与文天祥的交往情况、作品内容等梳理可见:在文天祥就义后的十余年间,进行相关创作的文人不下20位,除邓光荐、王炎午、王幼孙、谢翱、张弘毅、刘辰翁、赵文、李谨思等庐陵旧友、幕府部下外,还有如汪元量、何梦桂、龚开、林景熙、萧立之、胡斗南、黄诚性、方夔、刘埙等故宋遗民,以及徐世隆、戴表元、牟巘、刘宣等仕元士人<sup>⑥</sup>。此外,据笔者目力所及,尚有一些作品未被收入《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如元人赵景良所编《忠义集》卷六收有唐泾诗《江南四忠节国之纪也歌以哀之》三首,其中论文天祥云:“同时人物今犹昨,只有先生死朔方……三复累臣吟啸集,天荒地老气苍苍。”<sup>[10]43921</sup>彭秋宇诗《读吟啸集》感慨:“丈夫一为纲常死,表表人间万古传。”<sup>[10]42817</sup>上述作家与文天祥或曾深入交往,或有数面之缘,或素昧平生,文天祥就义带来的心理震撼促使他们加入了这一主题创作的队伍。经由这些诗文,士人们与文天祥和南宋朝建立了精神关联,他们在痛悼、赞颂文天祥的同时,也在哀叹南宋之亡,抒写时代之痛。

就创作方式而言,除文人个体的书写外,还有与群体祭拜、追思活动相伴随的集体创作。刘岳申《文丞相传》载,文天祥殉国后,“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应和为歌,更置酒酬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贺”<sup>[2]494</sup>。类似置酒应和的活动必然不少。如谢翱在宋亡之际曾加入文天祥的勤王队伍,听闻文天祥就义后,痛惜不已,分别于文天祥就义当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至元二

十八年(1291年)哭悼文天祥。其中第三次哭悼的详情载于其散文名篇《登西台恸哭记》:他与汐社成员吴思齐、冯桂芳、严允聚哭于桐庐子陵钓台<sup>⑦</sup>,一起“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sup>[14]201</sup>,祭拜仪式后“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复登东台……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sup>[14]202</sup>。此次哭悼尤为著名,文人方凤、危素、王祎、刘崧、张孟兼等人曾为谢翱该文作跋。

元末明初刘崧《跋西台恸哭记后》文中还记载了由张弘毅发起的一场追思会,张弘毅曾追随文天祥入燕京。王炎午《又望祭文丞相文》记载,张弘毅在文天祥就义后还收集其遗骸,背回庐陵,“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sup>[2]515</sup>。某日一晚他与刘惟吉、颜省身、刘实存四人在距文天祥旧居不远的“见山堂”聚会,众人举酒,张弘毅赋《摸鱼儿》词悼文天祥,其余三人同声相和,他们“每歌一再,辄声泪俱下,至呜咽不自胜,则相与掩袂罢去”<sup>[15]</sup>,其作品至明初尚“可考”。从文中可知,参与这场追思会的刘实存为作者刘崧的先祖,该记载当不虚。

此外,庐陵士人赵文曾加入文天祥幕府,入元后隐居不仕。文天祥归葬故乡后,他上坟祭拜,作有《正月十四日大雪上信国公冢》诗,另有词《八声甘州》题为“和孔瞻怀信国公韵,因念亦周弟”<sup>[16]</sup>,由此可见该词为多人和韵的怀念文天祥之作。

就作品体量而言,文体形式丰富多样,传、祭文、像赞、序跋、诗、词等悉备,现存篇目数以百计。仅以邓光荐、谢翱为例,邓光荐不仅撰写了墓志铭《文信国公墓志铭》、传记《文丞相传》<sup>⑧</sup>《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像赞《信国公像赞》等文,还有《哭文丞相》《挽文信公》等诗。谢翱留下的相关作品除《登西台恸哭记》一文外,还有众多怀悼文天祥的诗作如《邳州哭》《寄所知》《哭所知》《西台哭所思》《书文山卷后》等。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从所举作家、作品中,不难想见时人悼念文天祥的盛况。从内容来看,这些作品在表达对文天祥的痛惜、追思的同时,着重强调他的忠诚

和气节。文天祥有心扶危却无力回天，但他坚定不移的意志和从容赴死的勇气令人感佩，其人格源于青少年时期欧阳守道、江万里等名师的教导和庐陵地域文化中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等前贤精神的滋养。文天祥对于“忠”有自己的理解，临安城破后，宋恭帝被元人所俘，文天祥等人则拥立二王（赵显、赵昺），流亡海上。据《纪年录》自述：在监狱中，元相博罗责难文天祥“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sup>[2]462</sup>，他回答道：

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sup>[2]462</sup>

文天祥将君王与社稷明确区分开来，这是在易代之际对“忠”这一传统儒家理念做出的理性思考，此种对“忠”的体认和践行是其形象的核心价值，使其形象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就如邓光荐《文信国公墓志铭》中对文天祥的描述：“虽功业不能以尺寸，而志节昭乎终古。”<sup>[11]420</sup>

在宋亡已为既成事实的背景下，文天祥由于书生领兵带来的诸如军事实战经验欠缺、幕府管理松懈等不足变得不再重要，在相关作品中，对于代表文天祥生平的“功业”与“志节”两端，作者们多将其短于“功业”归因于时代，不做过多铺陈，而对文天祥的“忠节”这一精神内核大力彰显，无法抗拒的“天命”更增添这一形象的悲壮色彩。

诸多短篇如诗、词和赞、序等多直抒胸臆，以高度凝练、概括的语言赞扬文天祥的赤诚忠心和视死如归的气节。如萧立之《读文山诗》称他“此心耿耿赤如日”<sup>[10]39192</sup>，林景熙《读〈文山集〉》赞他“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sup>[17]</sup>，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赞他“孤儿以忠报罔极，拔舌剖心命何惜”<sup>[4]109</sup>等，不一而足。

相较于诗词，篇幅较长的叙事性作品如传记等出现较晚。现存文天祥诸传记中出现较早的除邓光荐作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墓志铭外，还有龚开的《宋文丞相传》等。这些作品多承续《纪年录》的内容和叙事策略，对于文天祥在宋亡前的官场沉浮简略带过，而详于记载他在宋亡之后的行迹，并着重刻画他奋起勤王、

被俘后多次拒降、赴死前南向再拜等情节，在详与略的对比中突出文天祥的忠义精神。

随着众人的参与及作品的传播，文天祥其人的影响力逐步发散至全国，由士人到普通民众，进入了文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层面。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文山书为北人所重”条载：文天祥就义前后，北方百姓已有“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sup>[18]</sup>的标榜；《纪年录》“壬午”条注文中也载元朝廷有“南方宰相无如文天祥”<sup>[2]465</sup>的认可。此二说虽为笔记野史，但成文之时距文天祥殉国未远，这意味着文天祥的忠义形象在当时已获得了超越地域、民族的普遍意义。

总之，历史伟人的出现绝非偶然，文天祥的忠直品格与报国行迹是其形象的基石，而宋元易代之际的多重书写则激发了这一形象的特质和价值。文天祥《指南录》《集杜诗》等作品造就其形象的魅力与张力，士大夫阶层的相关创作形成推动力，促使其形象走向典型化、抽象化。伴随这一过程，“丹心”“零丁洋”“正气”等词逐渐被视为文天祥形象的身份标识，生祭、西台哭悼等语成为与文天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符号，并在此后民族融合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被不时唤起，从而加深记忆。

#### 注释

- ①顾宝林、欧阳明亮：《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和建构——以文天祥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陈功林：《文天祥形象的塑造与演变》，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杨年丰：《明清时期文天祥形象的记忆与认同》，《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②刘华民：《〈宋史·文天祥传〉质疑》，《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 ③王莹：《家国、历史与叙事——文天祥自传文本中的“自我”呈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 ④吕薇芬、徐公持：《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浅论》，《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 ⑤陶渊明：《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6—197页。
- ⑥刘文源：《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⑦此三人名谢翱《登西台恸哭记》原文中不载，见黄宗羲《西台恸哭记注》文中考证，载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246页。
- ⑧邓光荐《文丞相传》原文已佚，部分内容被保存在文天祥《纪年录》的注文中。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
- [3]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47.
- [4] 汪元量.汪元量集校注[M].胡才甫,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5] 何梦桂.何梦桂集[M].赵敏,崔霞,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146.
- [6] 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14.
- [7] 程钜夫.程钜夫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245.
- [8]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14.
- [9] 李修生.全元文:第5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87.
- [10]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5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2] 李修生.全元文:第54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533.
- [13] 吴师道.吴礼部诗话[M]//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604.
- [14] 谢翱.晞发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
- [15] 刘崧.刘崧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1300.
- [16] 杨廉.全元词[M].北京:中华书局,2019:482.
- [17] 林景熙.林景熙集补注[M].章祖程,注.陈增杰,补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329.
- [18] 周密.癸辛杂识[M].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186.

**Self-shaping and Other-shaping: The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en Tianxiang's Image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Liu Tingting

**Abstract:** The initial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en Tianxiang's image were shaped through a dual process involving both self-representation and external portrayal. Starting from his works such as Guide and Collection of Du Fu's Poems after he raised troops to serve the king, he consciously preserv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image. Following his capture at Wupo Ridge, scholars honored him with poems and tributes and visited him in prison, further enhancing his image with an exemplary significance. After his execution at Chaishi, the whole society widely mourned and praised him, solidifying his character. Wen Tianxiang became a model of loyalty and integrity. By tracing and analyzing relevant literary works, events, and phenomena within the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one can clearly see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authentic individuality of historical luminaries evolved from coexistence to fusion with their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This exploration offers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rich mentality of the scholars and the literary style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 words:** turning point of dynasties; Wen Tianxiang; image; generation

[责任编辑/晨 潇]